



# 毛泽东身边的“五大秘书” (三)



叶子龙，原名叶良和、叶佐臣，1916年12月29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

家庭，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叶子龙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年仅19岁的他就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7年。作为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几十年春风秋雨，叶子龙一直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陪同毛泽东两次访问苏联，护送毛泽东进京，从延安的枣园、河北的西柏坡，到北京的丰泽园，这期间凡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忠厚诚挚的品格，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多次得到毛泽

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称赞。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冒着很多常人所无法想象的风险，同时也要有超乎寻常的勇气。叶子龙在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时也曾被人诬陷过，这就是所谓的“窃听器事件”。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有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有着强烈的目的性，从不做无用的事，不说无关痛痒的话，所以对他说过话要格外的留心。进城以后，叶子龙总想尽量地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为此叶子龙想过很多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采用录音的方法。录音作为现代化记录的手段，对于记录、整理、保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

讲话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实践证明效果也很好。早在延安时，为了准确记录领导人的讲话，我们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人员，直到解放后速记仍是记录领导讲话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机要室的工作越来越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了。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的核心秘书部门却没有记录人员，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为此，叶子龙几次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谈这个问题并请示周恩来筹划录音工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机要室便陆续购买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门的录音人员，不料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诬陷成所谓的“窃听器事件”，说成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是“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在这所谓“秘密录音”

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

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牵连了中央和地方单位的一些负责人，使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叶子龙也受到株连。

叶子龙把毛泽东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是毛泽东把他从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培养成为一名党的干部，同时叶子龙也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多方面的精神财富，到1962年5月，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他告别了毛泽东，离开了中南海就再也没有回去。叶子龙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83年7月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6月离职休养。

2003年3月叶子龙在北京逝世。(据人民网)

## 『继位』之路：

## 蒋介石如何传位给蒋经国

晚年的蒋介石有一块心病，那就是总在担忧自己去世后大权旁落。所以对自己的身后事可谓处心积虑。为了使儿子蒋经国在自己百年之后顺利接班，他确实煞费苦心。这一历史过程鲜为人知，长期以来属于台湾当局机密。

台湾学者邱家洪在《政治豪情淡泊心——谢东阁传》一书中说，谢东阁对他当年做的“最高机密”的事情非常得意，认为他“为台湾的安定与发展，做了一件划时代的大贡献”。

这个“最高机密”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帮助蒋介石“家天下”的密谋得以实现，助推蒋经国成功“接位”。

事情得从蒋介石败居台湾时说起。国民党残余兵败初到台湾时，蒋介石从大陆带去的军政人员几乎占据了台湾的所有官位位置，台籍人士在官场谋到一个科员位置也不易，此举造成逃台的大陆军政人员与台籍人士矛盾十分尖锐，台湾民众对此也十分不满。

时间的车轮滚到了1971年年底，蒋介石觉得儿子接班的阻力已基本清除，加上自己年事已高，儿子蒋经国也已60岁了，于是决定将接班之事提上议事日程。但让儿子来接班，老子说不出口啊，这个事还得由别人来提比较好，尤其是由台湾本土人士提出更有说服力。

这个自然难不倒老谋深算的蒋介石。1972年2月底，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带着蒋经国到台湾南部的日月潭休息。他们一家在日月潭涵碧楼住了两天后，蒋介石便叫侍从通知台湾省议会议长、台籍政客谢

东阁和南投县长林洋港到日月潭，他要召见。

蒋介石在听完工作后，似乎漫不经心地问到，蒋经国随他来台工作了一二十年，社会上对蒋经国的看法怎么样。谢东阁何等聪明，回答得非常得体，还借机对蒋介石和蒋经国大大歌颂了一番，使在场的蒋氏父子十分高兴，双双笑逐颜开。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蒋氏父子认为，谢东阁是一个对蒋家忠诚、可靠的人，可以信任和利用。如果提拔他做台湾省省长，对国民党和蒋家大有好处，并能为蒋经国接班当推手。

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召见了与蒋经国关系极好的总政战部副主任王升上将，告诉他说，这段时间，社会各界纷纷要求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还有千余名“国大代表”联名上书（实际上是蒋介石在背后策划的），台湾省议会“议长”谢东阁的愿望尤其强烈，他在多个高层会议上推荐蒋经国，说他可担大任。他还对王升说，既然社会上对经国如此推崇，你到雾峰去找一下谢东阁，让他正式写一封举荐信给党中央，使大家都感到经国做院长是人心所向。但这个信一定要写好。

特务出身的王升，跟蒋氏父子打了二三十年的交道，熟谙官场上的那套。老蒋的意思，他一一听就明白，于是马上说：“总统放心，我马上去找谢东阁办此事。”

很快，王升找来一个大笔杆子，以谢东阁的名义草拟了一封举荐信。信中称蒋经国“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确为多难兴邦的辅弼俊秀”，还说：“经国先生既然众望所归，为全国上下所共举，即是民意之所趋，是故顺应民意，以安民心，就是大智大爱，实为万民称颂之丰功伟业。”

王升将信带到雾峰，谢看后，知道是蒋介石授意的，当即表示愿为“国家”举荐人才，并同意在信上签名盖章。并拿出省议会的公用信笺，让他的秘书抄了一遍，最后盖上自己的印章。

蒋经国看了王升带回的谢东阁的举荐信非常高兴，并对王升夸奖了一番。随后，蒋经国又将举荐信送给蒋介石看，老蒋也很满意。

第二天，蒋介石又将此信交给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说这封信是谢东阁特地派人送到台北来的，谢关心“国家”大事，其爱“国”之心令人钦佩，嘱咐他在下次中央常委会上宣读。

1972年5月26日，国民党举行中常委会议。会议开始半小时，蒋介石示意张宝树将谢东阁的举荐信递给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看。严家淦看了信，知道这是蒋介石要儿子接班。虽然心

里有点不高兴，但他想，这种事自己想挡也挡不住，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主动让出职位，以满足蒋氏父子的欲望，反正自己年事已高，再干不了多长时间了。

想到这里，他走到蒋介石身边低声说：“总统，那我今天就在会上辞去副总统和行政院长，并力荐经国先生接替我的职务。”蒋介石见严把话说明了，就说：“副总统就职才6天，不能辞，你只辞行政院长。”

就这样，这次中常会在会前搞了一个临时议程，讨论谢东阁的举荐信和严家淦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并提名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张宝树宣读举荐信后，会上鸦雀无声。因事情来得太突然，与会者不知如何应对。严家淦讲完后，会上仍然没有人表态。蒋介石见冷了场，便提议说：“赞同副总统提议的，请站起来！”与会的中常委慑于蒋介石的权势，都站了起来。不过，张宝树宣读谢东阁的举荐信时，蒋氏父子均面带笑容，严家淦却不太高兴。按规定，“行政院长”本应由“总统”提名，蒋介石怕外面议论，改让严家淦提议。忍辱负重的严家淦照办了，严家淦能如此做出牺牲，事后蒋介石自然少不了对其慰抚一番。

于是，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老子做“总统”，儿子做“行政院长”的特殊的政治架构出现在台湾。一时间，中外媒体对蒋氏父子的这种做法纷纷进行抨击。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蒋经国的任命后，娴熟于政治运作的蒋介石接着又采取了两个举措：一是指示国民党宣传部在《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和《联合报》上刊登文章，称颂蒋经国的才德；二是策动国民党“立法委员”吴春晴在“立法院”搞了一个书面宣传稿，对严家淦辞去“行政院长”称赞了一番，以平息部分“立法委员”的不满。结果在“立法院”通过蒋经国的任命时，在408票中，蒋经国得了381票，顺利通过了任命。

1975年4月，蒋介石病死，严家淦继任“总统”。但因此时蒋经国继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实际大权都握在他手上。

蒋经国成功地“子承父业”，1978年-1988年，十年内连任两届（第六任和第七任所谓“总统”），直至1988年1月13日因糖尿病引发多重器官衰竭，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对于当年与蒋家做的这桩政治交易，谢东阁一直守口如瓶。直到1999年4月，进入暮年的谢东阁想到自己来日不多，才将这件“最高机密”披露给他写传记的台湾学者邱家洪，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据新华网)

## 元宵节的来历

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the Lantern Festival），是我国传统节日元宵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其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称为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

元宵节的节期与节俗活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延长、扩展的。就节期长短而言，汉代才一天，到唐代已为三天，宋代则长达五天，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至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

上元，含有新的一年第一次月圆之夜的意思。上元节的由来，《岁时杂记》记载说，这是因循道教的陈规。道教曾把一年中的正月十五称为上元节，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合称“三元”。汉末道教的重要派别五斗米道信奉的神为天官、地官、水官，说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并以三元配三官，说上元天官正月十五日生，中元地官七月十五日生，下元水官十月十五日生。这样，正月十五日就被称为上元节。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正月十五日元宵，乃上天官赐福之辰。”说天官赐福，地官赦罪，而元宵节俗真正的动力是因为它处在新的时间点上，人们充分利用这一特殊的时间阶段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愿望。

元宵节花灯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因明帝提倡佛法，适逢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称印度摩竭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众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因此正月十五夜燃灯的习俗随着佛教文化影响的扩大及道教文化的加入逐渐在中国扩展开来。

又说元宵节起源于“火把节”，汉代民众在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兽，希望减轻虫害，祈祷获得好收成。直到今天，中国西南一些地区的人们还在正月十五用芦柴或树枝做成火把，成群结队高举火把在田头或晒谷场跳舞。隋、唐、宋以来，更是盛极一时。参加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至晦而罢。当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至今仍是民间传统节日。

另有一说是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元宵节的节期与节俗活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延长、扩展的。就节期长短而言，汉代才一天，到唐代已为三天，宋代则长达五天，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至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

